

試論“一國兩制”的近代起源

常 樂*

“一國兩制”是人類社會關於國家和平統一和國家治理的偉大創舉，這一制度除了體現主事者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治國經驗之外，還凝聚和吸收了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教訓。由於“一國兩制”的原創性和探索性，以及它在香港、澳門和未來台灣的模式差異，註定在實踐過程中面臨諸多的困難和挑戰。而從制度發生學的視角來看，如果能夠較為清晰準確地梳理出“一國兩制”產生時的直接決策依據、理論基礎和慣性制度資源，那麼不僅有助於更加精準地理解和闡釋“一國兩制”，還能夠較為準確地把握住“一國兩制”實踐中的精髓和實質，對“一國兩制”台灣實踐的盡快到來也可能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本文即嘗試解讀鄧小平“一國兩制”決策的直接依據與歷史脈絡，通過這種可能性的歷史闡釋，呈現出“一國兩制”的另外一種歷史面向，從而為其實踐帶來一種新的思考視角。

一、學術史的回顧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有關“一國兩制”理論及其歷史淵源的討論成為中國學術界以及國際學術界的一大新特徵。其中，專門討論“一國兩制”決策的歷史淵源和政策依據的學者也大有人在，包括本人所瞭解的黃仁宇、齊鵬飛、強世功等著名學者，研究時間跨度較長，前後承繼明顯。

《香港基本法》頒佈不久，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較早開始探討“一國兩制”的起源問題。他從中外

大歷史的角度認為“一國兩制”“早已在各地前後發生，並非今日始”。此論一方面否定了中國“一國兩制”的創舉性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也給了“一國兩制”一種最為寬泛的理解，只要在一國範圍內一些地區間的制度有所不同，都可視為“一國兩制”的範疇。他列舉了歷史上“一國兩制”的四個典型，第一個例子是中國的元朝，當時，“元朝立國之後稅收南北不同，華北用租庸調制，華南用兩稅制。”第二個例子是南北戰爭前的美國，“當日北部禁止畜買奴隸，南方則認為合法，這在國家法令及社會組織同屬一國兩制”。第三個例子是荷蘭，“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荷蘭民國崛起與歐洲舊體制抗衡的時候，她將聯邦制的一個觀念發揮得徹底，以後對內外之影響至為深巨。她的作為也可以視作將一國兩制之原則伸展到極端的一個表現。”當時荷蘭組成了一個由 7 個省區組成的共和制的聯邦國家，當時聯邦統一性的法律制度很不規範，7 個省區都高度自治，且各個省區的權限也不相同，如“在一個時期內荷蘭省堅持有和外國訂約之權，不受聯邦約束”。第四個例子是 17 世紀的英國，這時英國的司法制度區分為“合法的法制體系”與“衡平的法制體系”，“當然也屬於一國兩制”；“這不由於當日創造，而是長時間互世紀所積累的結果”。不過，黃仁宇對“一國兩制”的認識雖然極為寬泛，但是他對這一制度的相關特性的認識卻有着一一定的道理和啟示意義。首先，他指出了“一國兩制”的現代性特徵。“在我看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有別於尚未現代化的國家在其政務可以用數目字管理”，“即使在過程中有一國兩制的辦法，其需要兩

*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種立法，或是兩種司法體制，也是緣於歷史及地理上的要求”。其次，他指出了“一國兩制”的自然性特徵。他認為，“從上面四個例子看來，一國兩制並非設計者創制的花樣，而是自然的發生”；“一國兩制由於內部經濟不平衡的發展而發生，當中涉及地理及歷史因素”。第三，“一國兩制”的矛盾性特徵。他認為，“一國而兩制，必有尷尬的地方”。他尤其指出了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的社會，“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律之中含糊之處可能引起日後無限糾紛。不僅所謂‘全民最高主權’及‘多數最高主權’之名值得歷史家仔細窺探，並且因一國兩制產生之憲法問題現有歷史記載仍有參考價值”。第四，“一國兩制”的歸一性特徵。他認為，“一國兩制”多產生於國家某種“分裂”現象存在的時候，“但是分裂的情形既已發生，即無可避免，只有兩方諒解，從一國兩制做到一國一制”。¹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也學習了黃仁宇擅長的大歷史觀念，並用這一觀念去考察“一國兩制”的歷史脈絡和歷史依據問題，只不過他的這一視角更加聚焦到中國的大歷史上。強世功首先認為目前學術界很少對“一國兩制”的歷史性和理論性內涵作系統地研究和思考，以至於斤斤計較於“一國兩制”的字面意思和糾結於一些制度安排，因此發現不了“一國兩制”所蘊含的普世價值和政治哲學，更難以彰顯中國的“軟實力”。² 然後，強世功教授分別從中國大歷史的長視角和短視角考察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和政策淵源。強世功從短視角指出，“一國兩制”方針脫胎於中央對台政策已為人所共知，但它與中央解決西藏問題的內在關聯卻少有人注意。事實上，毛澤東在1948年闡述對中國地緣政治思考時，就把西藏與港、澳、台問題放在一起，只不過西藏是傳統的陸地邊疆問題，而港澳台是近代中國才逐漸展現出來的海域邊疆問題，二者既有不同的地方，但也有相互貫通的地方。為了解決陸地邊疆的問題，1951年中央通過前述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解決了西藏問題。一直到1959年西藏叛亂，“十七條協議”可以看作是中央治理西藏的基本法。但如果比較一下“十七條協議”與中央對台政策的“葉九條”以及中央對港方針“十二條政策”（後來發展為《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中

的14條政策和《香港基本法》），就會發現後來的內容隨着時代的發展越來越豐富，但基本框架和精神實質是由“十七條協議”定下來的。這三份文件貫穿了一些共同的政治原則。³ 由此，他得出結論：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思想實際上來源於毛澤東提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思路，具體就來源於“十七條協議”。⁴ 並得出了雖然“‘一國兩制’思想無疑是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鄧小平從來沒有講這個構想是他自己獨創的”⁵結論。從長視角，他也發現了中華帝國治理邊疆的“一國兩制”式的政治遺產。他指出：中華帝國興起於秦漢，繁盛於唐宋，發達於元明清。尤其大清帝國運用一套成熟的、靈活彈性的政教制度，將中華帝國治理邊疆的憲政體制發展到極致，有效解決了唐宋以來一直沒有徹底解決的邊疆問題。這套政制的核心就在於在捍衛帝國主權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採取因地制宜的個別統治的政策。在這些制度中，尤其以對西藏的治理最為典型。⁶ 大清帝國對西藏的治理基本上也是採取“一國兩制”的思路，駐藏大臣的任務主要是體現中央對西藏的主權行使，而不是具體治理，畢竟對西藏的日常治理掌握在達賴、班禪以及噶廈政府手中。⁷

從長視角、大歷史以及地理因素的角度看“一國兩制”的起源問題，不僅有華裔學者(如黃仁宇)，內地學者(如強世功)，外國學者也有類似的觀察。英國學者Dick Wilson就認為，“一國兩制”更適合於中國，也只能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出現。“一國兩制”中的“國”並不同於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而更接近於中華文明的文化界限，或者類似於中華帝國時期漢族政權對邊疆少數民族的鬆散式的治理關係。而西方世界中則沒有與中國相似的國家，既擁有12億人口，還轄有逾30個省區，它們的面積與差異都與歐洲不同的民族國家相類似。因此，這就使中國比任何西方國家都更容易採取多樣化的政治制度。⁸

其實，就現行制度和政策的研究而言，由於時間較近和資料較多，短視角的研究則更為便利，似乎也更具現實性和吸引力。⁹ 早在2004年，齊鵬飛教授就對鄧小平“一國兩制”新思維的形成問題作了專門研究。齊鵬飛的研究聚焦於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時間界限，更加深入地論證了解決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出台的台灣路徑。首先，他認為“一國兩制”香港模式的出現存在一個十分緊迫的倒逼機制，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即是開啟解決香港問題的“敲門聲”。但是，這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於香港回歸問題並沒有準備，更沒有納入議事日程，給中央的決策造成了較大的混亂和爭議。其次，實際上存在一個“台灣版”的“一國兩制”“香港化”的問題，時間從1979年至1982年上半年，歷時3年。第三，鄧小平正是基於對“1949年的香港”到“1979年的香港”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深入瞭解，才確立了將“制度不變”作為維護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戰略出發點和支撐點。¹⁰齊鵬飛的這一研究成果既為強世功的研究所吸收，也為此後的短視角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思路和研究框架。¹¹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有關“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產生淵源問題的研究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歷史文化因素突出，當代人多將這一當代制度視為傳統中華帝國或中華文明治理邊疆少數民族政策的一種現代延續，一種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理性工具選擇。二是不少因素都直接強調了“一國兩制”產生的地理因素，無論是邊疆、海疆，還是西藏、台灣、香港，似乎都具有這樣的地理屬性，但是真的如這些學者所描述的，“一國兩制”產生於邊疆也只適用於邊疆嗎？三是所有學者在研究“一國兩制”的決策起源問題時，都有明晰的時間因素，要麼是涵蓋整個中華帝國範疇的大歷史觀念，要麼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二十餘年的歷史。

應該說，上述三個研究特點，或者說是研究傾向，或者說是研究結論，都似乎建立在一定的客觀性基礎之上，都有合理的成分，似乎都走進了歷史的真實，真的反映了歷史的一個側面。但是，本文認為即使將這三個要素疊加糅合在一起，所得出的結論仍只是對“一國兩制”起源解說的一部分，因為它欠缺了一些更為重要的東西：一是鄧小平所親歷的中國近代社會的歷史進程，包括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各個層面，都形塑了他的觀感、思想與政治經驗；二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各個歷史時期的歷史使命、歷史任務、歷史貢獻所形成的決策指向、決策模式和決策經驗。而這兩點都是鄧小平所親身感受、親自參與、親自構建

的政治決策的堅實基礎，本文即希望在這兩個缺失方面做些補充，使歷史的綫索更加完整，並超越所謂邊疆、民族等偏狹因素的局限，而進入到國家普適性決策的範疇。

二、中國近代“一國兩制”式的思想和制度

鴉片戰爭後的中國近代社會的最大特徵，就是出現了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這一社會性質(以下簡稱“兩半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這一“兩半社會”一方面喪失了部分的國家主權，另一方面又勉強維持着傳統封建集權式的統治，因此具有濃郁的傳統性和保守性；同時，與傳統的以王朝更迭面目出現但實質卻是具有“超穩定社會結構”的靜態社會不同，這一“兩半社會”卻是諸多異質因素滲入且處於急劇變動中的社會，時人謂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一急劇社會變化，既有外力促動的因素，更是由內力自強、自救的因素所決定，總之，也符合了在近代這一歷史時期當中古老中華帝國逐漸向現代國家轉型的世界範圍內的國家演進規律與趨勢。從這一角度看，外國的殖民勢力也客觀地為中國傳統社會帶來了不少西方現代化的因素，從而就使得中國近代社會的思想和制度等諸多領域呈現出中西對立的二元要素，或者中西融滙的新的綜合物。從現代角度看這種現象，可以說也是一種“一國兩制”式的思想和制度。應該說，成長和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人們，自然就會形成這種二元對立或者二元融通的中西二元思維方法，也會制定出兼具二元而又超越二元的制度、政策、措施和辦法。鄧小平就是成長和生活在這樣環境中的一位偉人。

(一) 近代“一國兩制”式的思想

這裏所謂的“一國兩制”式的思想或制度，必須具備兩個特徵，一是有明顯的中西二分意識和中西二分的要素，二是這種中西二分要素一般還都具有現代性，或極具現實合理性，或代表着社會發展進步的趨勢和方向。

在中國近代110年的時間裏，既簡練、又著名、且指導社會實踐影響深遠、還蘊含中西元素的思想，

主要有三：一是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二是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三是毛澤東提出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三者都是“一國兩制”式的思想，這三種思想不僅在他們所處的時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對於後世即使是今天，仍然發揮着潛移默化的作用，成為了中國人的重要的思想基因。

在中國剛剛被動進入近代社會以後，割地賠款，列強環伺，國力疲敝，怎麼辦？是當時全中國人的疑問。魏源在《海國圖志·原敘》指出了歷經萬難、寫作是書的目的，並大聲疾呼：“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並且指出“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¹² 應該說，魏源的這一思想開啟了近代先進中國人的救亡圖存之路，雖然這條路並不平坦，有時候也遭到了重大挫折，但是這是弱國、落後國家走向振興、走向復興的必由之路。此後中西關係的思想不管如何變換，這也是一個基本的思考基調，只不過在當時語境中所產生的仇視、對立的情緒會逐漸的淡化，直至消失。

魏源的一路向西的指向很快就有了結果，洋務運動就是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軍工、技術等的學習模仿的自強運動，雖然剛開始只是西方技藝、物質等現代性因素的增加和累積，但是物質、技術的產生離不開制度，也離不開思想。到了洋務運動的後期，由於多重因素的影響，這是中國思想界又要有人作出引領、區分和澄清，提出更加明確、具體的與西方關係的思考合作路徑。這個人就是晚晴重臣張之洞，他在其 1898 年寫成的名著《勸學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

張之洞的這一思想為甚麼會出現？應該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隨着洋務運動成果的逐漸累積，人們必然會從對西方先進的物質器物技術層面的興趣，逐漸延伸到其制度和思想領域中去，從而動搖和危及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制度信仰，在中西二元文化和制度的比較及優劣方面，必須予以及時、清晰和權威的澄清與矯正；二是隨着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洋務運動的精華——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整個社會也正在思考何去何從的問題，當時頑固派、維新派甚至革命派都

在進行着激烈的思想交鋒，社會亟需明確思想的指引。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應該說是一個調和各方而又比較穩健進取的思想，為當時中國現代性因素的積累提供了實際的助力。它所提出的向西方學習的內容，已經從以前的重物質和技術，逐漸過渡到對西方政治制度層面的學習，社會對“西學”範疇的理解在不斷地擴大。且從政府層面看，清末諸項新政的推行，以及最後君主立憲制的全國範圍內的嘗試，應該說都是這一思想指導下的結果。

民國成立以後的一、二十年間，社會思想十分駁雜，既有價值取向傾向西方的“民主、科學”的口號，還有“打到孔家店”的口號，還有人宣揚“全盤西化”，更有人開歷史倒車，妄圖復辟帝制，或者發起全國範圍內的“孔教”運動。正是因為這些思想的相對一元化的思想指向和價值取向，它們產生之後往往在社會生會引起巨大的爭議，甚至對立和武力鎮壓，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中國近代社會已經適應了思想界的二元對立和二元融通現象，並且這種思想狀況有助於思想的穩定、社會的穩定和社會的進步。因此，在這一思想十分駁雜的時期，起着基本作用的還是魏源、張之洞等的思想框架，只是程度不同地吸收和容納了一些影響較大的極端或激進思想而已。當然，這種思想界的亂狀，也亟需新的思想的重塑和昇華。毛澤東的思想就應運而生了。

1942 年 5 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系統闡述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思想。這一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蘊含着深刻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精神。這一思想不僅可以運用在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戰綫上，實際上它作為方法論，已經成為後發國家的各個領域思想指針。毛澤東所提出的這一思想，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產生了重要作用，就是在建國以後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處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在打破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封鎖，在處理港澳等歷史遺留問題，在改革開放國策制定和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出台，等等重大歷史事件的背後都有着它的思想印跡的作用。

（二）近代“一國兩制”式的制度

這裏所謂的“一國兩制”式的制度，是一個比較

寬泛的概念，既包括“兩制”分立並存的制度，也包括“兩制”融合的制度；既包括上層建築中核心的政治制度、軍事制度，也包括社會公共管理範疇的各類制度。從這一角度看，近代社會當中，“一國兩制”式的制度十分普遍，當時人們從質疑到接受，再到習以為常、司空見慣，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趨勢。

1. 政治制度

首先看中西融滙的政治制度。

西方因素較早滲入中國，其實是從宗教開始的，進入近代社會以後，也是西方的傳教士不斷深入內地，為西方列強“開疆擴土”充當了急先鋒。因此，在政治制度層面，吸收了西方因素的，反而是當時低下層的農民階級與西方宗教外衣的結合，從而出現了持續十餘年的太平天國政權。它就是中國的封建王權與西方的基督神權相結合的產物，雖然基督神權僅是它利用和操縱的工具。從這種中西混合型制度的自身來說，它是東西方兩種落後政治傳統的合體，不能代表當時世界範圍內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其落後性一目了然。但是，從其造成的社會影響來看，它對清王朝腐朽統治的沉重打擊以及對西方殖民統治的阻滯，都較大程度上有利於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的過渡，因此也就具有了積極的意義，也可將它納入到中國近代向西方學習以求國家振興富強的歷史序列中去。

客觀說，清政府在面對西方列強咄咄緊逼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下，還是想着在政治體制方面作出調整和新的探索的，只不過這一工作與社會急速發展和現實需要相比，比較遲緩和程度不足而已。比之日本，其明治維新早於中國，且改革比較徹底。而晚清政府在兩次鴉片戰爭的沉重打擊下，只在物質技術層面發生了自下而上的洋務自強運動，政治制度層面仍是一潭死水。及至甲午戰爭失敗，真是要到了亡國滅種的時刻，清政府也才不很情願的接受了知識階層發起的維新變法運動，由於統治上層的矛盾和鬥爭，竟也是曇花一現而已。八國聯軍進北京、皇室西狩之後，整個滿清統治階層看到了大勢將去、大廈將傾，必須要順應民意進行改革了。所以在其統治的最後十年間，才重拾康梁遺緒，力行新政，並在全國推行君主立憲政體。而這就是中西融滙的政治制度。

其實，晚清政府對於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並不是

簡單的“拿來主義”，也有自己的“探索”和“加工”。早前就有維新派的宣傳和上書，1905年前後也有五大臣出東西洋考察憲政，從當時的西方強國英國、改革後起的東方大國日本和中國數千年來的王朝政治傳統看，清王朝採用君主立憲政體應為不二之選。但是它對西方君主立憲政體的“改造”卻十分拙劣，“皇族內閣”不是當時君主立憲國家的普遍做法，而是滿清貴族對權力過度留戀制度變體。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披着資產階級外衣、內涵高度封建性的政治制度，已經不能滿足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現代性強烈訴求，所以武昌新軍的一聲槍響，就射穿了外強中乾的清朝封建統治。

民國肇造，西方資本主義的共和政體，總統、國會、總理等現代性制度架構一應俱全，但是仍脫不了封建皇權的內在實質。袁世凱的皇帝夢、張勳復辟帝制、北洋派系長期把持北京政府權力……，都體現了中華民國政治制度的這一特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也仍是以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和“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統治，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而已。歸根結底，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是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和封建主義多股政治勢力聯合對廣大民眾的統治，表面看是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實際也糅合進了中國封建傳統衣鉢，中西的融滙竟然以這種面目出現，只能以歷史的悲劇來概括了。

再來看中西分立並存的政治制度。

鴉片戰爭失敗，開啟了中西分立並存制度的格局。中西分立、並存的政治制度，一方面是西方在華較為獨立的行使其多項權力及其制度，浙西制度和權力所及都有一定的區域和範圍；另一方面在上述區域範圍外的廣大中國地域，仍然奉行中國既有的各類政治制度。這就使中西分立並存的政治制度，二者互有界限，無不相干，“一國”之內“兩制”分野明顯。

《中英南京條約》首開惡例。從此，中國領土主權受到破壞，香港島的割讓，讓英國“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在中國國土上出現了一個完全不歸中國政府管轄、制度迥異的行政區域。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口通商之設，中國的領海主權、關稅主權、司法主權都受到侵凌，英國通過軍艦停泊口岸、中英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等制度而在五口行

使一定的權力。此後，隨着中國半殖民地程度的不斷加深，割讓給俄國、日本等的領土不斷增加，通商口岸也在沿海、沿江領域不斷拓展，列強在華管治權力也不斷擴大，逐漸形成了被割佔領土、通商口岸或租界以及仍在中國統治下的廣大區域等三大類型的管治模式。這三種類型的管治模式及其所奉行的政治制度，都可視為“一國兩制”式的，只不過“兩制”的範圍和程度不同而已。從時間來看，這種多類型的“一國兩制”管治模式從晚清一直持續到民國時期，互延百餘年。¹³

2. 軍事制度

中國近代社會的軍事制度也是類型多樣，差異巨大。其出現原因和政治制度多元化的大背景相同，當然也有中國自己特有的一些因素。晚清政府的軍隊就有多種類型和制度，舉其大者，有八旗兵制度、綠營制度、團練制度、新軍制度等等，各兵種、各制度並行不悖。中國政府自己多種軍事制度之外，西方的軍事要素也不斷滲入中國。首先由於割地、通商口岸、租界等特殊區域，外國一般駐有軍艦和軍隊，這是國家主權喪失的表現。其次，近代還曾出現過西方僱傭兵現象，如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時曾委任華爾和戈登統帥以外國人為主的洋槍隊(時成為“常勝軍”)。¹⁴再次，清政府從編練新軍開始，就開始聘請和招募外國軍官按照西式戰法訓練中國軍隊，在打仗時還擔任中國軍隊的軍事指揮顧問，如甲午戰爭時南北洋軍隊中都聘有外國軍事人員。這種現象也一直持續到民國。

3. 社會公共管理制度

由於中國近代社會上沒有西方式現代化的公共管理制度，因此這裏所謂的公共管理制度主要有兩種表現，一種是中國傳統社會自我生長起來的本土型管理制度，另一種是西方傳入和西人所主導創立的制度，這兩類制度都是從比較寬泛的角度去認識和解讀的。比較典型的如慈善公益制度。晚清一降，中國就一直存在多元化尤其是中西截然對立的兩類制度。中國的是遍及各地的各種善會善堂，養老、育嬰、恤孤、敬節等都有專門機構。而西方的傳教士則在中國開辦有教會學堂、育嬰堂，還開辦有西式醫院。早期這兩種制度並存，也是在洋務運動之後，得風氣之先的一些口岸如廣州、上海，當然更包括香港等地，則逐漸成

立了中西滙通融合的慈善公益性組織。如中國紳商向西人所開辦的醫院的捐款，中外人士一起開辦的萬國紅十字善會，民國成立後的各種華洋義賑會等等都是如此。與此相似，中國近代教育制度也處於中西二元分立和並存的狀態，由於大家比較熟悉，此不贅述。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社會的思想、政治以及社會等多個領域都存在這種中西二元並立與融滙的現象。這種社會現象持續時間很長，從晚清以至民國，近110年。在這個社會成長的人，受大環境的影響，受思想和制度的形塑，很容易產生這種中西二元分立和融滙的思想與行為路徑。尤其我們這裏所談到的“西”，就是遠遠優於傳統封建社會的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社會制度和產業技術。而與它並存或嫁接的“中”，則隨着時代的變遷、社會的演進在不斷變化，從封建專制制度，到資本主義共和體制，再到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正是中國近代這種突出的社會特點，給了後人“向西”和“肯定西方”的思維和決策路向，也就為新中國成立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出台提供了一種可能。

三、中國共產黨在涉資本主義問題的三次重大決策

如前所述，由於中國近代社會存在着代表着社會發展方向的中西二元分立、並存、融滙的思想和制度實踐，因此，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具備了這一思想基礎和決策方向。加之，中國共產黨本身也是中西融滙的思想和制度的產物，因此，她的這一傾向性則更為突出。其表現就是在與代表着西方社會發展主流的資本主義打交道時，並沒有簡單地、教條地採取階級鬥爭的絕對思維，而是既強調中西二元(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內在關係)分立，又強調並存，還強調融滙，作出了三次重大的戰略性決策，取得了豐功偉績，推動着國家從獨立走向復興的偉大歷史進程。

(一) 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締造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雖幾經變革和挫折，仍努力於建立一個統一、民主、獨立和富強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中國共產黨從其創立始就是一個具有嚴格黨性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共一大所提出的黨的奮鬥目標就是以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客觀說，國共兩黨性質迥異，其階級基礎和奮鬥目標也截然對立，本是一對敵對的政黨。但是，由於當時兩黨都面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共同任務，都有力量不足需要革命同盟軍的共同願望，因此，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就確定了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隨之，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由共產黨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輔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這次國共合作，共產黨組織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國民黨也十分認可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合作方式，並給予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實質性權力。國民黨一大所選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當中，就有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包括執委和候補執委)，約佔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等。由此可見兩黨合作之緊密程度。這次國共合作，大大加速了中國革命的進程，摧毀了封建腐朽的北洋勢力，使國民黨初步統一了全國。但是，由於國民黨右派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叛變了革命，國共兩黨的合作沒有持續下去。

(二) 共產黨政權服從於資產階級政權的領導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標誌着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中華民國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但是，在這一全國性資產階級政權的統治下，並沒有解決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問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

本主義仍是壓在廣大勞動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為了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遺志、完成資產階級尚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工農群眾通過艱苦的革命鬥爭，在江西建立了與南京國民政府相對立的具有無產階級性質的蘇維埃政權。但是由於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侵華戰爭，中華民族處於危機存亡的時刻，中國共產黨為着建立最大範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在延安與中國國民黨通過和平談判，結束了內戰對立局面，實現國共聯合抗日，中國共產黨在陝北所領導的地方政權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這時所領導的陝北邊區政府，當時也稱為“特區政府”¹⁵，擁有獨立的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重要人事任免的權力也基本獨立(如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軍事主官接受國民政府的任命)，保留自己的軍隊(但納入國民政府序列)和貨幣，不向國民政府交稅等等。應該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在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領導的同時，保持了高度自治的狀態。這種體制很有點類似於當前港澳特區與中央的關係，或者更接近於未來台灣地區與國家的關係。只不過那時的“一國”，是以資本主義制度為主體的中華民國，具有一定社會主義性質的制度則是“兩制”當中的補充了。

在這種類似“一國兩制”的體制下，國共兩黨合作雖多有摩擦和衝突，甚至流血鬥爭，但是這種體制在當時卻也是一種無奈之舉，也是當時的國情使然，即便這樣，從客觀效果看這一體制也具有很強的活力和優勢。中國共產黨在體制內推動着國民政府堅持聯合抗日，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組成最大範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民政府主要在正面戰場，中國共產黨主要在敵後戰場，經過8年艱苦卓絕的軍事鬥爭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一洗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

(三) 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的新認識

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後，逐步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但是在這一重要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在對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問題上十分審慎，對國內和國外的各種資本主義因素都作了系統深入的甄別、判斷，並以此形成長

期堅持的國家大政方針。鄧小平的很多思想建國後都是一以貫之的，並且很具代表性。

首先，黨內普遍認為，即使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即使國內的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消滅，但是現在“還有國內和國際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還是一種客觀存在”；“在勞動人民中，也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從所有制上消滅資產階級不難，但從政治上、思想上消滅資產階級影響就不容易”；因此，要“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來進行階級鬥爭，這樣有利於分化敵人、進行改造”。¹⁶ 把資本主義因素和資產階級問題放到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進行思考，看到它們存在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去處理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問題，是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方面逐步形成的一條基本經驗。

其次，中國共產黨區分了國內兩種性質的資本主義成分，肯定了它們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作用，並確立了長期的方針政策。一是對於建國前已經存在的民族資產階級，“國家用贖買的方法把資產階級的企業收歸國有”。“用贖買的方法，是根據我們自己的情況決定的，國家有能力把他們的企業作價拿過來，給他們一定的利息……，使資產階級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¹⁷ 國家為民族資產階級支付定息的政策，從 1956 年開始到 1966 年結束，持續 10 年之久，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二是對於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其管治權尚不在我手的香港、澳門地區，國家制定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¹⁸ 的特殊政策，為國家賺取外匯、積累建設資金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再次，樹立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的導向。建國以後，中國在對外交往方面確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來改善我們國家的經濟面貌”。¹⁹ 建國之初，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際存在着一種敵對和隔離狀態，除了朝鮮戰爭外，1954 年 12 月美國還與台灣當局簽訂了所謂的“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英國、法國等八個國家還於該年 9 月簽訂了對中國帶來很大戰略威脅的《東南亞防禦條約》。但是即便這樣，中國仍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與世界各國的交往，“同不同社會

制度的國家友好相處，這是我們世世代代都要進行下去的”²⁰；“我們在國際上的原則，就是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²¹ 這裏面當然就包括數量更多的資本主義國家。

發展國家經濟、改善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除了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還需要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在 1963 年 12 月鄧小平就指出，“日本在世界上是科學技術先進的國家”，“我們是一個大國，但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我們歡迎日本朋友在這方面給我們幫助”。²² 十年之後，鄧小平對此感到更加迫切。“我們很希望能得到西方的一些先進的技術來進行我們的建設。我們願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下發展同世界各國的貿易”；“我們的原則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進行各方面的友好往來”。²³ 由此可見，鄧小平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進性方面的認識是深刻的，也是十分清醒的。²⁴ 這種長期的觀察和思考，不僅是後來改革開放基本國策形成的一個基礎，也是“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形成的一個基礎。

最後，中美蘇三國的大國博弈間接催生了“一國兩制”。二戰以後，以美蘇為首世界形成兩大敵對陣營。在中蘇度過了近十年的蜜月期之後，兩國關係急劇惡化，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兩國戰爭一觸即發。正如鄧小平所說，“自從斯大林死後，如何面對蘇聯又成了我們面臨的一個新問題。現在對我們威脅最大的來自北方，這個歷史很長。蘇聯把百萬大軍放到我們的邊界上，我們對這個問題並不怕，問題是要保持警惕，要有準備。不準備，不警惕，那危險性就更大”²⁵ 在面臨新問題的同時，中國還要處理老問題，那就是美國在台灣的問題，進一步說就是中美關係問題。從建國到 20 世紀 70 年代初，“美國卻佔領着我們的領土台灣”，同時，“美國在我國周圍建立了幾個軍事條約組織，有好多軍事基地，第七艦隊也在我國周圍。雖然這樣，我們仍然同它進行談判……，中心問題是美國要霸佔台灣，要我們承認‘兩個中國’，那辦不到。”²⁶

由於新老問題的同時存在，中國在中美蘇三大國之間初看起來危險最大，但是深諳辯證法的領導人有足夠的智慧，知道大國博弈的主要對象和戰略重心。

鄧小平指出，“現在所謂爭奪，最突出的是兩霸爭奪。爭奪哪裏？一般都是從表面現象上看，以為中蘇關係緊張，就說爭奪重點在東方。但歷史事實證明，世界最重要的地方還是歐洲，兩次世界大戰都先在歐洲爆發的”。²⁷ 如此一來，世界上爭奪最嚴重的雙方還是美國和蘇聯，並且兩國爭奪的重心仍是在歐洲，那麼，美蘇兩國如果戰略不作相應調整，最後必將面臨東西兩面作戰，擁有東西兩個戰場。歷史同樣證明，東西兩面作戰最終註定也是要失敗的。

歷史證明美國是明智的。尼克松總統秘密訪華，開啟了中美關係和解的破冰之旅。當然，台灣問題仍是橫亙在兩國面前的一個最重要問題。尼克松訪華之前，中美之間基本是敵對的關係，兩岸也處於武力對峙狀態，零星交火不斷。

即使在這種局面下，中國共產黨也有與蔣介石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誠意。鄧小平早在 1957 年就詳細談到這個問題：“其實，人人心裏都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堅如磐石，不可動搖，各方面成績巨大。蔣介石打不回來，就要想另外的道路。我們的政策是，回來就無罪，回來就算有功。蔣介石的罪總不算小吧，但只要脫離美國控制，回到祖國來，將功折罪，還算有功，還應該有一個職位。周總理對外國記者說，總不能低於部長。部長以上是甚麼職位，大家商議，總是要過得去。當然，台灣問題複雜得很，不是短期能解決的。但是我們有個政策，不是叫第三次國共合作嗎？蔣介石實在不願意改變台灣現在的制度，也可以暫時保留；軍隊不願改編，我們不改編；蔣介石、蔣經國原意叫誰當台灣省的省長都可以。台灣總是中國的一個省，不願叫省叫區也可以。能夠和平解放台灣，當然很好。但我們從來沒有放棄武力解放，這要看條件變化。”²⁸ 由此可見，特殊對待統一後的台灣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內很早就有佈局和深入思考，這一思考隨着中美建交談判的日益深入而日趨成熟，這也是“一國兩制”方針最先形成於台灣問題解決的原因。

兩國開始建交談判之後，雙方不斷試探，希望取得最大共識。²⁹ 正如鄧小平所說，“關於台灣問題，我們的立場很清楚。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我們總要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的最後統一。採取一切必要的方式解放台灣是我們的責任。當然，我們希望能

夠和平解放”³⁰；“我們希望能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如果不行，只能採取其他方式。原則是台灣必須回到祖國懷抱”。³¹ 在中國正義立場的堅持下，中美兩國在 1978 年 12 月 15 日簽訂了建交聯合公報，16 日發表，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聯合公報正式生效，標誌着中美兩國正式建交。

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生效的同一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指出“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這一“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在 1981 年 10 月 1 日，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具體化為“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九條方針政策”（簡稱“葉九條”），這一般被公認為“一國兩制”的雛形。由此可見，在上世紀 60-70 年代中美蘇三國的大國博弈的過程中，中美關係最終走向正常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副產品，就是國家確立了和平統一台灣以及統一後尊重和保持台灣現狀的基本方針，這也隨之成為國家解決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前奏。

四、幾點啟示

一是對於“一國兩制”起源問題的認識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毋庸諱言，文化、地理、民族等因素對於“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出現和形成會有一定的影響，據此也可梳理出相對系統和長遠的歷史淵源，但是我們不能過於強調這些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自近代以來“一國兩制”式的思想和制度的出現，正是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基礎大變動的文化和政治反映，而上世紀 70-80 年代“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出現，也是國際和國內範圍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競爭較量之後的政治反映。離開了社會大的經濟環境的變化，對於相關思想和制度的認識都是膚淺的，表面的，既無助於反映問題的實質，更不利於指導實踐。

二是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和交往是保持中國共產黨

先進性和提高黨的治國理政能力的重要途徑。歷史表明，無產階級政黨既脫胎於資本主義，又將長期處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和交往當中。歷史還表明，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採取關門主義，黨的事業就有可能面臨困難和挫折，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採取開放主義，黨的事業就會取得進步和成功。如前所述，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多年來，始終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看待資本主義，始終從有利於革命、建設和發展的角度虛心接納資本主義，正是這種近距離甚至無距離的交往與合作，才使得中國共產黨在一個最強力的對手面前不斷取長補短，完善自我，時刻保持其先進性，不斷提高治國理政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長期性。近代以後，中國落伍了。但是中國人不甘於落伍，而是奮起直追，在這一過程中就出現了一個潮流，就是向西方尋求真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以後，由於中國尚處於初級階段，仍需要繼續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也就是說，近代以來的逾 170 年間，中國向西方學習，尤其是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的腳步是沒有停止的。這一過程反映到思想和制度層面，就是前述不同時期、形式各異、程度不一的“一國兩制”式的思想和制度。目前中國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的進程當中，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又提出了與世界各國交往的“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和實踐模式，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與合作將會更加深入和持久。“一國兩制”作為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交往

的國內反映，其存在也將是長期的，其發展也將更有活力。

四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共融性。從近代歷史可以看到，中西兩種異質性的制度一開始都會有一個十分明晰的邊界，這種邊界不僅是地域和行政區劃的邊界，還包括社會領域某些職能性制度的邊界。但是隨着社會的發展，先進的元素或者適宜社會發展的成分逐漸都會躍出這些人為劃分的邊界，而向更廣的區域和更大範圍的社會領域滲透。在這一擴展和滲透的過程中，兩種異質性元素會進一步磨合、融滙從而成為更適合該國或該地區需要的新的制度和政策，這一創新過程也就是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也可稱之為本土化的過程。也只有經過這一過程，西方先進的制度成分才能真正落地生根，為我所用，逐漸化為中國本土的東西，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成為自己的一個重要傳統。“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踐到現在尚不足二十年，但是“兩制”之間的融合早已跨越了邊界。“9+2”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京港、滬港、粵港、深港等多個跨區域的合作，內地企業赴港上市、人民幣國際結算中心、滬港通(以及即將實現的深港通)，以及上海浦東、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廣州南沙等的自貿區建設，則都是“兩制”在制度層面融合的表現。正是在“一國”範圍內“兩制”的融合是一個必然的長期的趨勢和規律，才有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50 年不變，以及 50 年之後也沒有必要變的戰略決斷。

註釋：

- ¹ 黃仁宇：《一國兩制在歷史上的例證》，載於《過渡期的香港》，香港：香港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1993 年，第 29-40 頁。港台學者翁松然同黃仁宇一樣，也視“一國兩制”為國家治理的一個工具，具有矛盾性、強制性和過渡性特徵。見 Weng Sunran (1985). A Preliminary Stud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Nineties*, No. 191, 轉引自 Dick Wilson：《China, the Multi-system Country》，載於《過渡期的香港》，香港：香港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1993 年，第 67 頁。
- ² 強世功：《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北京：三聯書店，2014 年，第 151 頁。
- ³ 同上註，第 153 頁。
- ⁴ 同上註，第 159-160 頁。

- ⁵ 同上註，第 151 頁。
- ⁶ 同上註，第 162-163 頁。
- ⁷ 同上註，第 168 頁。
- ⁸ Dick Wilson：《China, the Multi-system Country》，載於《過渡期的香港》，香港：香港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1993 年。
- ⁹ 近年來一批曾經參與“一國兩制”最早決策和中英談判的親歷者的回憶錄和訪談錄陸續出版，具體描述了當時的決策過程，也提供了大量決策信息，為這種短視角的研究提供了直接資料，同樣也影響了研究者的思路和方向。見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1997 年；魯平、錢亦蕉：《魯平口述香港回歸》，北京：中國福利會出版社，2009 年；張春生等編著：《周南解密港澳回歸——中英及中葡談判台前幕後》，香港：中華出版社，2012 年等。
- ¹⁰ 齊鵬飛：《鄧小平關於香港問題的調查研究和“一國兩制”新思維的初步形成》，載於《中共黨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 ¹¹ 比如，有人也指出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產生的台灣脈絡，並指出“形成於 20 世紀 50、60 年代的經由周恩來概括又經毛澤東統一的中共對台政策之‘一綱四目’似為‘一國兩制’理念的雛形”。見龐嘉穎：《一國兩制與澳門治理民主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
- ¹² 魏源：《海國圖志·原敘》，陳雲等點校，長沙：岳麓書社，1998 年，第 1 頁。
- ¹³ 嚴格意義上講，一些特殊的租界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才被國家收回，如 1997 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1999 年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等等。
- ¹⁴ 詳細情況及制度性內容請參閱[美]R·J·史密斯：《十九世紀中國的常勝軍——外國僱傭兵與清帝官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 ¹⁵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陝甘寧政府在 1937 年底之前一般稱為“特區政府”，之後則統稱為“邊區政府”。1937 年之前雖然稱為特區政府，但是黨委則一直稱“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也可簡稱“特區黨委”）。當時政府的日常政務、文件、條例等都以“特區政府”的名義行文，如該年下發或制定的《陝甘寧特區經濟建設計劃草案》（該年 4 月 30 日制定）、《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關於進行特區政府民主選舉的指示》（該年 11 月 22 日發佈，該指示標題是“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但是指示的抬頭是“特區各級黨部”，落款也是“特區黨委”）、《陝甘寧特區政府頒佈抗日軍人優待條例》（見《解放週刊》1937 年 12 月 4 日，第 1 卷第 26 期）、《陝甘寧特區民政廳關於結婚證離婚證使用問題的通知》（該年 12 月 20 日下發）等。以上文件依次見中共延安幹部學院編：《延安時期資料選編》（經濟建設卷），2010 年，第 9-14 頁；《延安時期資料選編》（政治建設卷），2010 年，第 37-41 頁；《延安時期資料選編》（社會建設卷），2010 年，第 1-2、259 頁。
- ¹⁶ 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載於《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4-55 頁。
- ¹⁷ 鄧小平：《搞建設要有一套正確的方針政策》，載於《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87 頁。
- ¹⁸ 針對這一特殊政策，齊鵬飛教授曾撰有專文，系統梳理和分析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由來、內容和作用。見齊鵬飛：《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49 年至 1978 年新中國對於香港問題和香港的特殊政策》，載於《中共黨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 ¹⁹ 鄧小平：《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載於《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89 頁。
- ²⁰ 鄧小平：《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指導我們的國際關係》，載於《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310 頁。

- ²¹ 鄧小平：《中國的立國原則》，載於《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2-313頁。
- ²² 鄧小平：《中日兩國人民要友好的願望是障礙不了的》，載於《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9頁。
- ²³ 鄧小平：《我們總的經驗是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載於《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5-316頁。
- ²⁴ 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不僅是建國以後鄧小平長期思考的問題，也來自他年輕時在法國勤工儉學是的切身體驗。1964年1月鄧小平在會見法國議員訪華代表團時有個回憶，說“我對你們的國家不是很生疏，我在你們國家呆過五年，不過那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時你們已經是很發達的國家”。見註19，第190頁。
- ²⁵ 同註21。
- ²⁶ 同註19。
- ²⁷ 同註21。
- ²⁸ 鄧小平：《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黨同群眾的聯繫》，載於《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1頁。
- ²⁹ 關於中美蘇三國的博弈，以及中美兩國建交過程中的鬥智鬥勇情況，親歷者基辛格有深入細緻的描述。見[美]亨利·基辛格：《論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 ³⁰ 鄧小平：《採取一切必要的方式解放台灣》，載於《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4頁。
- ³¹ 鄧小平：《要從政治態度和政策角度考慮中日關係》，載於《鄧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0頁。